

大学语文辅助教材

中国文学史讲义

浙江教育出版社

封面题字 侯镜昶
责任编辑 郑广宣
封面设计 骆恒光

中国文学史讲座

*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46,000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3,000

统一书号: 7346·239

定 价: 1.81 元

序

浙江省大学语文协作组的同志们辛勤地编写完成了《中国文学史讲座》(辅助教材)一书,即将付排,希望我写几句话。我要说的话,就是谢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你们的确已为广大读者做了一件很需要、很有益的事。

“大学语文”课程的重新广泛开设,并越来越受到全国数以万计高校在校同学和社会上参加高教自学考试同志们的欢迎与重视,这是语文教育历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是高教改革和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事实将不断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大学语文”决不只是为了补救中学语文学习上的不足。它有更远大的目标,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应该帮助广大青年在大学阶段进一步学到丰富扎实的语文知识,提高运用知识的技能,养成勤于观察、善于思索的习惯,锻炼他们在阅读、鉴赏、写作、演讲几方面都有较强的本领。不能设想一个人在连最基本的学习工具——本国语文水平都很低的情况下,会做好较复杂的工作,学到较深刻的知识。我相信,随着“大学语文”课的开设,各类专业的大学生和自学青年,还将要求学习更多一些的文艺内容,包括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和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除了

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工具，文艺在思想品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促使大脑健全发展、培养创造能力等方面的重大作用，已逐渐获得公认了。

《中国文学史讲座》注意到同“大学语文”课配合并突出通俗性和知识性，这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的。现在采用较广的教材，为篇幅等条件所限，难以在专题方面多加扩充。但不少读者是需要这类知识的；通俗易懂、由浅入深的读物，正可对他们起一种启发作用，引导他们由此逐步深入以至文艺的堂室；对学习教材里的名著，也一定有加深理解之益。

祝贺同志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经过广大师生的教学实践，吸收群众的智慧和科研上的新成果，必然还会有更多的进展。看到“大学语文”教学研究工作的不断出现新的实绩，我是深感庆幸、欣慰的。

徐 中 玉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于上海

目 录

序.....	1
诗经.....	1
先秦散文.....	12
历史散文.....	13
诸子散文.....	20
屈原和楚辞.....	31
司马迁与传记文学.....	42
汉赋及其衍变.....	53
乐府的演变.....	65
魏晋南北朝五言诗.....	76
建安诗歌.....	76
两晋南北朝诗和陶渊明.....	85
唐诗.....	98
初唐诗坛.....	101
边塞诗派和山水诗派.....	107
李白和杜甫.....	117
中晚唐诗人和白居易.....	129
唐宋词.....	139
唐五代词.....	139

北宋词	148
南宋爱国词	158
唐宋古文	168
韩愈和柳宗元	170
欧阳修和苏轼	177
宋诗和陆游	188
元代杂剧和散曲	200
杂剧	201
散曲	214
明清传奇和汤显祖	221
明清诗词	232
明清散文	244
古代短篇小说	255
魏晋小说和唐代传奇	255
话本和拟话本	265
《聊斋志异》	275
古代长篇小说	283
《三国演义》	283
《水浒传》	291
《西游记》	299
《红楼梦》	306
《儒林外史》和清末谴责小说	312
近代诗文	324
后记	336

诗 经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我国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光彩四射。作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都应祖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采的文学遗产而自豪，继承其优秀传统，发掘其艺术价值，以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古代文学的起源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人类世界，也创造了文学和艺术。远古人类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首先由于相互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需要而产生了语言；同时，为了协同动作、调剂精神，往往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呼喊声，即今天所谓的“劳动号子”。《吕氏春秋》记述古史旧闻中有“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谿(yú)，后亦应之”的话，这“舆谿”又作“邪许”(yé hǔ)，都是劳动时众人一齐用力前呼后应的“劳动号子”。“劳动号子”是诗歌的雏型，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幽默地把我们祖先中那些无名姓留下来的最早的文学家们称作“杭育杭育派”。总之，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文艺，最初的文学艺术是同生产劳动直接相关的。

人类有了语言，也便有了文学。可以想见，还在原始社会里，已经有了丰富的口头创作，可惜今天我们已无从领略那些作品了。不过古代文献中根据世代口头传闻，也有过一鳞半爪的记

载,我们还可窥其一斑。如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的俗字)。”歌辞大意是:割断竹子,连结成弓,飞射出泥弹丸,追逐禽兽。它反映了原始社会的狩猎生活,歌颂了劳动人民发明弓弹的智慧。音节有力短促,语言形象朴素,表现了原始诗歌的独特风格。再如《尚书·商誓》中记载了这样一首民谣:“时日害(通“曷”)丧,予及女偕亡!”其中的“日”比喻夏桀,大意是:“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我愿跟你一起灭亡!”它反映了夏末商初的奴隶们对暴君的愤怒,说明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文学就表现出它强烈的阶级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我国的远祖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创造了劳动歌谣,也创造了许多许多瑰玮奇丽的神话传说。诞生于战国时期、秦汉时曾予增补的地理名著《山海经》,里边就保存了不少远古的神话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历来脍炙人口。其他如《淮南子》中的“后羿射日”、“共工触不周山”、“嫦娥奔月”等,也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神话故事中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斗争精神和坚强意志,想象奇特,气势磅礴,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

尽管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已经有了不少原始的口头文学作品,但由于有声语言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基本上没有留传下来。自从产生了文字,古代文化遗产才得以记录和保存,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几千年前的文学作品。

我国汉族文字的产生,历史当是很早的。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古老的文献,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易卦爻辞,以及我国第一部散文集《尚书》。在这些文字中,已有一些略具文学色彩的内容,特别是易卦爻辞,很多是朗朗上口的韵文,内容也颇生动具体。可是要讲文学,只从《诗经》开始。《诗经》是用

比较丰富而统一的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的产生 奔腾不息的黄河，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广袤无垠的大河上下，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亘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在这块大地上，并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化。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就是二千五百多年前在这里诞生的。它是中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千百年来，人们吟咏它，研究它，经久不衰。关于它的文章著作汗牛充栋，不可胜计，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这便是“诗经学”。由于年祀绵邈，关于这些诗歌的若干背景真象已难考定。本讲仅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撷取某些已有定论的问题，作一简略的介绍。

《诗经》本来只称“诗”、“诗三百”或“三百篇”。言“三百”，只是举其整数，实际上收入的诗歌有三百零五篇。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提倡读经，从此《诗》便被奉为垂教万世的宝典，称为《诗经》了。秦代焚书之后，《诗》因人们讽诵教习，口耳相传，因此，汉初就有传授。西汉传《诗经》的有四家。齐人轅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所传的分别叫“齐诗”、“鲁诗”、“韩诗”，合称“三家诗”。它们都是用汉时通行的隶书文字写的，统属“今文经”。而鲁人毛亨和他的弟子赵人毛萇所传的称“毛诗”，它是用先秦籀文写的，属于“古文经”。把三家诗同毛诗相比较，前者说解断章取义，烦琐寡要；后者则较注重字义训诂，诠释简明。至东汉，著名经学大师郑玄给毛亨的《诗故训传》（解释《诗经》的著作，简称“毛传”）作了“笺”（对毛传加以补充和发挥，简称“郑笺”），使毛诗的释义更趋精密。从此以后，学毛诗的人日渐增多，而三家诗则走向衰废。流传至今的唯有一部《韩诗外传》，其余的都亡佚了。现在所流传的《诗经》，就是毛诗。

《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

卫、王(指东周王畿)、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地区的诗歌,合称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一百零五篇。“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其中“商颂”实为春秋时宋国的作品。三大类的划分,在于音乐曲调的不同:“风”是地方乐调;“雅”有“正”义,是正乐之歌,即周王朝王都的歌曲;“颂”古通“容”,有舞容与舒缓之义,是庙堂祭祀用的调子缓慢的乐章舞曲。由此可见,“诗三百”最早都是入乐的,适于歌咏。后来曲调佚失,只剩下唱词,这便是后人所诵习的《诗经》。

收入《诗经》的作品,从时间上说,包括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这五百多年间的诗作;从地域上说,大部分产生于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带,包括今山西、河南、山东、陕西等地区,最南到湖北北部的长江流域。如周南、召南就产生于江汉流域。由于大多是民间口头流传而后采集编定的,所以具体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都已无从确切考知。《诗经》反映了群众集体的艺术智慧。那些无名诗人虽然湮没无闻了,但他们对文学作出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汉代经师曾煞费苦心,把诗同历史事实相比附,考证各篇的作者,说这是“后妃之作”,那是“周公旦作”(见东汉卫宏的《毛诗序》),虽偶有可采,但大多属附会臆断之说,我们切不可轻信它。

这些历时几百年、地跨数千里而产生出来的诗篇,在当时各地语言不统一,交通又不便利的情况下,是怎样采集、写定并汇编成书的呢?从文献载籍上看,采集途径有二:一是“采诗”。《汉书·食货志》上说:“孟春之月,群居者(指奴隶)将散(散入田间劳动),行人(使者)振木铎(木舌的铃)徇(巡行)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专管音乐的官),比(配上)其音乐,以闻于天子。”这种“采诗以观民风”的制度,正是古氏族社会的遗风。二是“献诗”。《国语·周语》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的记载,这里

讲的是诸侯国的官员献诗；而《左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中又提供了另一种情况：“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民间乐工自下而上地向天子献诗。各地的民间歌谣、文人创作、庙堂乐章就通过多种渠道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周王朝的乐师那里。他们再经过一番编辑、整理、配乐的工作，然后命乐歌班子演唱给天子听。汉儒对于《诗经》编订过程的这一番猜测，基本上是可信的。至于孔子删定《诗经》的传说，则不太可信。因为《左传》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时，鲁乐工演唱的内容同今本《诗经》篇目大致相同，而那时孔子年仅八岁。不过，从孔子反复告诫门人“不学《诗》，无以言”这些话来看，他很重视《诗》，在《诗》的传播中倒确实是一个起了特殊作用的人物。

《诗经》的思想内容 每当我们打开这部五彩缤纷的诗集，眼前就会展现出一幅幅周朝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难怪人们常常把《诗经》比作“周朝社会的一面镜子”。三百篇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里仅就风、雅、颂三大类在思想内容方面各自的特点择要加以简叙。

民间歌谣是《诗经》的精华，它占了《国风》的绝大部分，《小雅》中也有一些。在这些民歌里，劳动人民唱出了他们的苦难和欢乐、愤怒和不平，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往和追求，从而具体、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历史面貌。如著名的《七月》，是《国风》中最长的一篇，诗中反映了奴隶们一年到头辛勤耕作渔猎，却过着“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惨生活。为大家所熟知的《伐檀》、《硕鼠》，则直接喊出了反压迫、反剥削的愤怒呼声，还进而表达了对理想的“乐土”的渴望。还有不少民歌，广泛描写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刻画了战士

思念家乡、妇女思念征夫的痛苦心情，表达人民对战争苦难的嗟怨。《东山》、《君子于役》就属于这类诗。也有一些诗篇，情调与怨战诗迥异。它们歌颂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如《无衣》中，即将出征的兵士激昂地唱道：“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表现出慷慨从军，团结御侮的勇敢精神。还有一首《载驰》也不可不知。这首诗，通篇洋溢着炽热的爱国热情。它的作者是贵族诗人许穆夫人，她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诗人。

爱情诗在《国风》里占有相当的份量。从内容看，有的写邂逅定情，有的写幽期密约，有的写刻骨的思慕，有的写内心的矛盾，有的写燕尔新婚之喜，有的写横遭遗弃之恨。真好似竞相开放的百花，各呈异彩。这些诗篇又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表白坦率直爽，感情真挚热烈。《诗经》的首篇《关雎》就是一首动人的情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
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芣之。窈
窕淑女，钟鼓乐之。

它写一位男青年的纯真爱情和相思之苦，也写出了他对美满婚姻的顽强追求。《关雎》可以说是《诗经》中优美的民间情歌的一支序曲。《毛诗序》以为此诗表现“后妃之德”，“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是不可信的。在《郑风》和《卫风》中，反映恋爱婚姻题材的民歌特别多。《氓》是一首诉说婚姻不幸的诗。主人公愤激的哀诉，道出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千千万万劳动妇女追求美满婚姻的共同心声。她初恋时的天真痴情，结婚后的忍辱负重，被弃后的刚毅坚强，集中体现了中国妇女善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

质。全诗以叙事为主，字字泪，声声怨，字里行间浸透着浓烈的抒情味。读到“吁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些诗句，也许有人会觉得言辞未免失之偏激，但只要结合受害者的辛酸经历设身处地想一想，便一切都可以理解了。封建卫道士们曾把郑、卫之声斥为“淫声”（如把《氓》的主题歪曲为“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然而，这丝毫也无损于《诗经》中爱情诗的艺术光辉。

《雅》诗中除民歌外，多属贵族文人的作品。其中思想性较高的是出自统治阶级内部受压抑的下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讽刺诗。这类诗过去被称为“变雅”。所谓“变”，是对“正”而言的。凡讽刺朝政昏乱，揭露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诗，都被贬为不合乎“正声”。这显然是一种偏见。在这些讽谕诗里，同是批评朝政的内容，所使用的手法又不尽相同。有的直言规劝，有的借古讽今，也有的借彼喻此，从而辛辣地讽刺了昏庸腐朽的国君和不可救药的西周王室。对人民在国家动乱中遭受的疾苦，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如《十月之交》这首诗，借自然界日食、地震等反常的自然现象，警告周幽王应当摒弃小人，悔改前行。诗中还指名道姓地指斥了上层统治集团中的几位权贵人物，显得颇为大胆。讽谕诗中还有一类则揭示了大官欺压小官，劳逸不均的不合理现象，抒发不平愤懑的情绪，如《巷伯》就是一首被谗遭害的抒情诗。诗中咒骂道：“取彼谗人（进谗者），投畀（给）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寒冷不毛之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让老天发落）。”读之使人有痛快淋漓之感。但是总的说来，《小雅》中的政治讽刺诗较之民歌，在思想艺术方面或较逊色。其中夹杂了一些糟粕，阅读时尤其要注意进行分析。

《大雅》中还有一类史诗也是不容忽视的。如《生民》、《公刘》、《緜》等，记述了从后稷出世到武王灭商的大量传说和史迹，

对于我们了解周部族的起源、发展以至建国的全过程，研究当时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面貌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诗中也宣扬了承天受命的宗法思想，反映了周民族的宗教观念。

最后说到《颂》。周朝统治者酬神祭祖的乐歌舞曲，大多集中在《颂》里，《风》、《雅》当中也间有夹杂。这些诗对周人从先祖到建国的发展历史，以及周王朝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有所反映，对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较有史料价值。但其中所表现的敬畏鬼神，宣扬天命，为奴隶主歌功颂德的思想内容，则不足取。在艺术上也比较缺乏感染力，枯燥板滞，是《诗经》中最差的部分。

《诗经》的艺术成就 《诗经》在艺术技巧方面有很高的成就。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赋、比、兴”。在文学史上，《诗经》是全面运用“赋、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的开端，历来为人们所重视。早在《周礼·春官》中，风、雅、颂、赋、比、兴就被概括为“六诗”，《毛诗序》则称之为“六义”。可见古人早已注意到从《诗经》中总结诗歌艺术的规律了。然而，把作为诗歌分类的“风、雅、颂”同作为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并提，且与“政教”硬扯在一起，这是有违《诗经》原意的。唐代作《毛诗正义》的孔颖达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这个说法比较在理，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采纳。然则赋比兴的具体涵义究竟是什么呢？宋代朱熹在《诗集传》里为之下了个清楚明了的定义：“赋者，敷（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下面略举数例以明之。

赋，是铺叙其事。如上文已提及过的《七月》，可以视为运用赋的一个典型作品。全诗共八章，细致地铺叙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农家生活：春耕、秋收、养蚕、打猎、缝裳、酿酒、营造、凿冰。描写细腻入微，字里行间充满着奴隶们的血和泪。赋在雅、颂中用得最多，抒情诗为主的《国风》中也不乏使用赋法的例子。

比，是指物譬喻。如《卫风·硕人》的诗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里叠用明喻和隐喻的句子，描写庄姜的美貌，显示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语言文字修养。后代诗文描写美女往往袭用这些诗句，无怪乎有人评价说，“千古颂美人者无出其右”了。还有通篇用“比”的。如《硕鼠》一诗：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

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把剥削阶级老爷的贪婪丑恶形象比作大老鼠，比喻贴切生动，揭露入木三分。这一类，有的称之为“比体诗”。

兴，是借物以起兴。如《关雎》从水边一对对笃于伉俪之情的雎鸠鸟的鸣叫声，引出下文君子追求淑女的缠绵悱恻情思的描述，其发端的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起兴。《氓》的第三、四章开头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也都是为下面的直抒胸臆起兴的。一般地说，兴句多用于发端，有触景生情、象征事物、烘托气氛、唤起感情等多种作用。有时兴句与正文并没有什么联系，解诗时不宜勉强牵合。“兴”还常常兼有“比”的作用，合称为“比兴”。

“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汉代辞赋家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中铺叙刻画的艺术手法，创造了“汉赋”这种文学体裁；从《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等，古代优秀的诗人们发扬渊源于《诗经》的“比兴”传统，创造出无数动人的艺术形象，形成了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独特风格。

面向现实，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描摹生活，表现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这是《诗经》的又一特色。这里试举两首描写战争题材的诗歌以见一斑。《东山》写的是一位出征归来的兵士在归途中的心情。远征结束解甲归乡

使他庆幸喜悦，而想象中战乱带来的家园荒芜又使他产生阵阵隐忧，久别的妻子近况如何更使他牵肠挂肚。这种亦喜亦悲、可畏可怀的复杂的典型情绪，正是长期战争给人民造成灾难和痛苦的典型时代气氛的真实反映。《采薇》可谓《东山》的姐妹篇。最后一章是这样的：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
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这首诗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兵士。他在抵御外族侵略的浴血奋战中不辞辛劳，英勇抗敌，表现出为国分忧的豪迈气概；而战争结束后，当他在归家路上不免还要过“载渴载饥”的生活时，又不禁悲从中来。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感情，正反映了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现实。类似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所以说，《诗经》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优秀现实主义传统的第一个高峰。它犹如一条红线，贯串在后代的文艺创作中。杜甫、白居易的诗，陆游、辛弃疾的词，关汉卿的曲，无不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有的作家还进而总结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如白居易就曾提出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同《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诗经》虽属上古的作品，但它在驾驭语言的艺术技巧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娴熟的程度，足以为后世垂范。从句法看，它是中国诗歌语言句式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基本格式是四言句，但又随着思想感情的起伏，根据文意的需要，插入二言、三言以至七言、八言等，长短交错，既工整而又灵活多变。后世五、七言为主的古典诗歌语言形式，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后人也有仿照《诗经》四言基本格式作诗的，如曹操的四言诗就写得相当出色。从押韵看，也富于变化。有句尾韵，也有句中韵；有一韵到底，也

有中途换韵；有隔句押韵，也有句句押韵或奇偶句交替押韵。其中最普通的格式是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包括首句入韵者），这便成了后代诗歌押韵的准绳。从结构形式看，重章叠句和反复咏唱最为突出，它体现了民间歌谣的章法特点。如《芣苢》全诗三章十二句，中间只更换了六个动词，却把劳动场面写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这种回旋复沓，一唱三叹的形式，宜于歌唱，饶有韵味，既便于口头流传，又可达到强烈的抒情效果。在词语的锤炼方面，《诗经》所使用的词语准确、生动而富有形象性。仅拿表现手的动作来说，就有“捋、掇、挹、握、提、拊、搗、抽、搔、拔、招、折、投”等五、六十个动词，足见诗人们观察客观事物的细致入微，语言表达的准确周密。他们同时还是创造和运用叠字形容词和双声叠韵联绵词的能手。“‘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嚶嚶’学草虫之韵。‘皎日’、‘曄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这番话，是对《诗经》用词富有表现力的绝妙概括。不少词语，至今还在继续使用，生命力很强，如现代汉语中“琢磨”、“踟蹰”、“邂逅”、“一日三秋”、“辗转反侧”、“信誓旦旦”、“殷鉴不远”、“同仇敌忾”、“不可救药”等复音词、格言和成语，都源于《诗经》。这部诗集，为汉民族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

（祝鸿杰供稿）